

试论“枫桥经验”中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

范佳华, 廖天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

摘要:2018“新时代诸暨市社区居民安全感调查”表明枫桥地区是一个信息全对称的高社会资本存量社会,治安志愿者、治安志愿者组织等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主体在纠纷化解、犯罪预防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且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治安志愿者、治安志愿者组织等非正式控制主体与枫桥社区安全感显著相关。最终发现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控制能够取得成功与我国“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传统治理文化、治理主体注重重塑集体记忆、将非正式社会控制嵌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搭建快乐体验路径来提升非正式控制能力密切相关。

关键词:枫桥经验;熟人社会;非正式社会控制;共识

中图分类号:D63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1-0030-06

A Brief Discussion on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of Communitie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in the "Feng Qiao Experience"

FAN Jiahua, LIAO Tianche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e 2018 Survey of Communal Residents "Sense of Safety in Zhujiaji City" in the New Era indicates that Fengqiao is a community with high social capital stock and full information symmetry.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bodies like public security volunteers and organizations play a key role i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crime prevention, an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informal control bodies like public security volunteers and organization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residents' sense of safety in the Fengqiao community. Eventually we conclude that the success in the informal control of community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in Fengqiao commun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fficial governance" in combination with "civil governance", to the governing bodies' focus on re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practice into people's daily lives, and to the paving of roads to happy experiences to improve the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Keywords: Feng Qiao experience; acquaintance society;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consensus

2018年是毛泽东主席批示枫桥经验5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枫桥经验15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节点”,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枫桥经验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发现中国知网篇名中涵盖枫桥经验的核心期刊以上文章共计30篇,但尚无从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相结合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为此笔者尝试着以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的非正式社会控制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已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对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实际绩效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一、文献回顾

笔者对涉及社会资本与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现今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犯罪学领域,但均有一个核心指向,那就是社会资本对非正式控制中起着基础性的地位,一个地域的非正式控制发展程度受着社会资本存量的深刻影响。

(一)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资本与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研究

社会学界对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研

收稿日期:2018-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单位社区安全危机及其治理创新研究(16CSH011);首都安全基地:首都安全风险特征与治理创新研究(CCSS2018ZSS03)。

作者简介:范佳华(1995—),男,内蒙古通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治安学、法社会学研究。

究最早起源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帕克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地区进行研究,发现非正式社会控制在社区内部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点研究了社区成员的异质性和流动性对非正式控制的影响。在帕克研究基础上,肖和迈凯提出了社会解组理论,重点关注了不同的社区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着社区的社会资本和非正式控制,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秩序差的社区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低、流动性强、种族异质性强等特点。现今社会解组理论已经经历了多次革新,但都强调稳定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关注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关系。例如,系统理论,重点论述社区采用社会互动网络的程度,这些网络能够将社区居民联系在一起,以有效调节社区内部活动的性质,进而增强社区非正式控制。后来系统理论逐步发展成为“集体效能”理论,该理论主张当邻居之间信任度高时,会产生很强的社会凝聚力,这是增强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基础。

国内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贺雪峰和陈柏峰,贺雪峰认为我国村庄并不是作为一个共同的行动者,而是当某一村民处于特定的社会事件中其可以动用起来的社会关系。在对抗地痞恶霸时他可以寻求自身的铁杆兄弟来共同应对、在遇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时其可以获得来自村庄舆论的道义上的支持,甚至是行动上的支持。但是当一村民在面对社会问题却不能调动任何社会关系时,那么这个村民便会失去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逐步成为边缘的群体。这样发展下去村民之间很容易成为社会关联度极低的独立个体,长此以往乡村社会便会暴露出大量问题,如治安秩序混乱、基础设施建设资源不足等问题。陈柏峰在研究乡村混混时发现,在我国不同地域的乡村混混扰乱治安的情况明显不同,湖南的村庄集体意识强,混混在村庄内的地位还比较低,而在江汉平原地区混混已经严重危害到治安秩序。

(二) 犯罪学界关于社会资本与非正式社会控制的研究

犯罪学对社会资本与非正式控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理论,分别是犯罪模式理论和人地功能理论。布兰廷厄提出了犯罪模式理论,其强调社区环境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认为不同的社区环境会对违法者决定实施犯罪产生不同的影响。该理论认为城市不同区域的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程度不同,而现代交通的迅速发展使人们在短期内进行远距离流动成为可能,把非正式水平较低的社区纳入罪犯的视野。泰勒提出了人地功能理论,该理

论吸收了多种观点来解释以居民为基础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如何发展和影响犯罪事件,其更关注于“人们如何以及为何管理不同类型的空间,以及这种管理缺乏所产生的后果”。该理论具有如下特征:首先,与物理环境有关。人地功能理论因地制宜,地域对居民的行为模式起着关键作用。其次,与社会气氛有关。人地功能理论是由一个地方的社会气氛构成的。社会气氛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地方社会规范的满意程度,对规范的普遍一致程度会导致社会气氛“从不稳定到和谐”的变化,进而导致人地功能在降低犯罪中的作用由低向高发展。第三,人地功能理论主要适用于小地方并可以面对面交流的群体,正是在这种面对面的互动作用中领土认知得到发展。领土认知决定着某一社区内部的相对控制水平,进而决定着当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时进行主动抵抗的可能性。第四,人地功能理论只有在较小的群体中实现和维持秩序时才能够有效,一旦群体规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便会减少,关于地方的领土认知将会下降。

二、枫桥地区是高社会资本存量的新型乡村社会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大传统时期我国是具有浓厚乡土色彩的“乡土社会”,人口流动率低,农民被束缚在十里八村范围之内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特征,这种地方性限制使我国的乡土社会具有“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但是今天中国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契约精神、个人主义思潮开始向乡村社会渗透,传统日常生活逐步裂变,呈现出生活方式城市化、人际关系理性化、社会关联“非共同体化”和村庄公共权威衰弱的诸多特征。贺雪峰认为这种转变使我国由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社会流动增加,就业多样化,社会经济分化,农民的异质性大大增加,村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家庭日益私密化,村民串门聊天大为减少,村民们更加需要公共生活的空间,越来越不适应过去那种针对性强而退出机制不足的串门聊天的闲暇消遣方式,需要更加公共化的自由进退的闲暇消遣方式。笔者在枫桥派出所考察时发现,虽然枫桥地区也经历了传统熟人社会的裂变,但依旧保持着高存量的社会资本。据枫桥派出所民警边赞介绍:枫桥地区最大的治安治理资源就是村子里的关系是熟人关系,大家愿意参加各种各类的治安志愿者组织,这样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消磨多余的时间,同时也使村

子里具有极强的社会组织能力。杜黄新村居民李佳介绍:咱们枫桥地区虽然近些年来也涌进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是并没有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大家在一起依旧是熟人,虽然现在诸暨买了房子,但是自己还是乐意住在村子里,有什么事大家互相帮衬,不像城里的小区,大家都很陌生(ljia20180610)。为了验证枫桥地区的高社会资本存量,笔者根据“新时代诸暨市社区居民安全感调查”数据,运用Stata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与自己所居住社区居民的熟悉程度”上,基本都认识的占比为51.95%、大部分认识的占比为30.03%、大约认识一般的占比为7.41%、认识一小部分的占比为6.91%、基本不认识的占比为3.71%。在“家庭遭遇困境时有多少邻居会关心”问题上,回答很多人关心的占比为68.77%、回答一些人关心的占比为23.62%、回答很少有人关心的占比为4.90%、回答没人关心的占比为2.70%。笔者对居民认识程度和居民之间的关心程度进行列联分析,并进行卡方检验(表1),结果表明居民认识程度与居民关心程度之间相关性显著(P 值0.000)。定量分析表明枫桥地区虽然正在经历着现代化的进程,但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非常高,大多数居民认为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关系是熟人关系,可以说枫桥地区是高社会资本存量的新型乡村社会。

表1 居民认识程度与居民关心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居民认识程度	居民之间关心程度/%			
	很多人关心	一些人关心	很少人关心	没人关心
基本认识	80.90	15.67	2.36	1.07
大部分认识	74.72	20.75	4.15	0.38
认识一半	57.53	38.36	4.11	0.00
认识小部分	43.52	38.89	12.96	4.63
基本不认识	31.34	29.85	14.93	23.88

Pearson chi2(20) = 228.9696 Pr = 0.000

三、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效能评估

(一)治安志愿者开展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评估

笔者基于“新时代诸暨市社区居民安全感调查”数据,运用Stata软件对“社区内见到治安志愿者频率”和“社区志愿者工作效果”两个问题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枫桥地区社区中经常见到、偶尔见到、见不到带有红袖标的治安志愿者分别占到被调查的66.87%、26.32%、6.81%。因治安志愿者工作效果涉及问题较多,故以表格形式呈现(表2)。据魏廉新村村民李强介绍:现在村子里的治安志愿者人数非常多,他们平时在村子里面负责巡逻、化解

纠纷、配合警察工作,还会对村子里的困难户进行帮助,效果非常好,大家都支持(LQ20180611)。

表2 治安志愿者工作效果分析

类型	%			
	好	一般	不好	没有效果
巡逻防控	80.08	19.42	0.10	0.40
提供破案线索	75.83	22.33	0.60	1.20
矛盾纠纷化解	79.42	19.24	0.30	1.00
提供便民服务	82.83	15.76	0.30	1.10

上述分析表明枫桥地区的治安志愿者队伍强大,在巡逻防控、提供破案线索、化解矛盾纠纷、提供便民服务方面效果均十分显著,同时也反映出民众非常认可治安志愿者工作。

为了进一步探究治安志愿者工作与枫桥整体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笔者将这两个变量进行了列联分析,并进行卡方检验,见表3。从相关性分析的整体态势上看,治安志愿者工作与枫桥整体安全状况之间关系紧密,在卡方检验中 P 值等于0.000,说明枫桥治安志愿者工作与枫桥整体安全状况之间显著相关。

表3 治安志愿者工作与枫桥整体安全状况之间的相关性

		社区治安状况/%				
		很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差	很差
社区志愿者工作	好	82.21	16.10	1.53	0.00	0.15
	一般	46.77	40.32	12.90	0.00	0.00
	不好	30.88	36.76	29.41	1.47	1.47

Pearson chi2(12) = 222.6278 Pr = 0.000

(二)治安志愿者组织开展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评估

在该部分笔者对如下三个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一是“您是否参加了治安志愿者组织”;二是“您所在社区参加志愿者组织的人员比例”;三是“您所在社区中参加志愿者组织的人员参加的是何种类型的治安志愿者组织”。

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参加了治安志愿者组织占比为53.71%,未参加治安志愿者组织占比为46.29%;被调查者认为所居住社区居民有很多参加了志愿者组织的占比为29.83%、有一些参加了志愿者组织的占比为41.14%、很少参加志愿者组织的占比为14.31%、没有参加志愿者组织的占比为14.61%;被调查者所居住社区居民参加平安类志愿者组织的人数占被调查者所居住社区居民参加志愿者组织人数的66.76%、被调查者所居住社区居民参加公益慈善类志愿者组织的人数占被调查者所居住社区居民参加志愿者组织人数的46.75%、被调查者所居住社区居民参加文化体育类志愿者组织

的人数占被调查者所居住社区居民参加志愿者组织人数的52.95%。据枫桥派出所副所长孙法均介绍:以红枫义警组织为例,虽然成立至今未满一年,但在枫桥的治安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五月份,该组织已经排除安全隐患50多起、调处化解治安纠纷近30起,协助破获重大刑事案件一起,并将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这反映出枫桥镇治安志愿者组织资源丰富,有一半以上的居民参与到了治安志愿者中,无论是在基层治安秩序维护领域,还是在刑事案件侦破领域,治安志愿者工作效果显著。

为了进一步探究治安志愿者组织工作与枫桥整体安全状况之间的关系,笔者将这两个变量进行了列联分析,并进行卡方检验,见表4。从相关分析的整体态势上看,治安志愿者组织工作与枫桥整体安全状况之间关系紧密,在卡方检验中P值等于0.000,说明枫桥治安志愿者组织工作与枫桥整体安全状况之间显著相关。

表4 志愿者工作与枫桥整体安全状况的相关性

		社区治安状况/%				
		很好	比较好	一般	比较差	很差
社区志愿者工作	好	82.21	16.10	1.53	0.00	0.15
	一般	46.77	40.32	12.90	0.00	0.00
	不好	30.88	36.76	29.41	1.47	1.47
		Pearson chi2(12) = 222.6278 Pr = 0.000				

(三)非正式社会控制主体化解纠纷情况

枫桥镇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即依赖于国家的正式控制力量,也依赖于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笔者对非正式控制力量在化解矛盾纠纷领域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见表5。从表5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枫桥地区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在纠纷化解中效果明显,而且物业公司、业委会、治安志愿者等新型的社区非正式控制力量工作效果要好于社区居民这一传统的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

表5 非正式控制主体纠纷化解效果 %

主体	有效	一般	无效	未参与
社区业委会	84.40	4.50	0.90	7.20
物业公司	84.78	4.76	3.81	6.66
治安志愿者	73.15	15.47	0.70	10.67
社区居民	67.28	19.23	0.97	12.53

四、枫桥地区基于社会资本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力量取得成效的原因分析

枫桥地区在基于社会资本的社区非正式控制上能够取得显著的成效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其内部

蕴含着自身的机理。这种机理基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也与国家正式控制力量注重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治理逻辑密切相关,下文将对非正式社会控制在枫桥能够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历史文化传统对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影响

“枫桥经验”的内核“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纠纷”是对我国大传统乡土社会基层治理经验的传承和发展。大传统时期我国在开展基层社会秩序维护过程中主要采取“官治”与“民治”相结合的方式。虽然我国在公元前3世纪便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通过科层体制渗透到了基层社会,并对基层社会秩序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我国在大传统时期长期处于“官治”主导,实行县以上“官治”与县以下基层的“民治”结合的基层秩序治理方式,特别是在宋代以后在基层形成了“以民治民”的治安传统,即以保甲、家族、乡约、团练、会社等社会组织或规范来维护基层秩序。马克斯·韦伯的“王权止于县政”、费孝通的“乡村礼治秩序”“马伯良的半正式和非正式执法机构”、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都与此治安传统契合。由于我国基层社会历史上长期缺乏现代国家权力的直接接入,大量的矛盾纠纷还是通过村民之间长期形成的具有集体共识的规范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纠纷大多是在乡村内部通过集体的智慧来解决的。而且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信息全对称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村民能够实现对集体其他成员遵守集体共识的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可以说我国大传统时期的“官民结合”的基层秩序维护方式是枫桥地区依靠居民开展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重要文化根源。

(二)通过拓展快乐体验路径的方式来提升社区的非正式控制能力

枫桥镇在进行情感治理过程中注重拓展与居民自我关联性较强的快乐体验路径。通过增强居民的快乐体验路径深度来提升其表达和参与的能力和意愿,进而提升居民作为自己所生活区域的治理主体意识,增强其参与治理的主动性。基层社会治理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从整体上看,直接表现为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居民内部的互动全过程。虽然情感在基层社会的治理中长期并没有被纳入理性的范畴,但是情感的效能却能够直接影响到理性的决策结果。当居民在快乐体验过程中感受到基层治理工作者的正向情感后,便会慢慢形成对所生活地域的认同,增强自身参与治理的能力。枫桥镇搭建的快

乐体验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红枫义警”组织。整合平安志愿者等群防群治力量,引导成立“枫桥义警”公益组织,探索“市场+公益”的群防群治社团化运作机制,通过警务志愿活动,有计划、有平台、有组织地发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提升群防群治队伍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让社区居民在“红枫义警”组织中体验到参与的快乐和集体情感的认同;二是组织开展“两美”评选。结合日常工作挖掘、收集平安建设中的先进事迹,组织开展“最美平安人、最佳平安事”系列评选表彰活动,对获奖的好人好事大力宣传并奖上门,及时彰显群众的奉献之美和正义之美,积极弘扬平安建设正能量。

同时笔者也对枫桥地区拓展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快乐体验路径进行了定量分析,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所生活的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经常每年举办很多次文化娱乐活动的占比为54.65%、每年偶尔举办几次的占比为34.13%、每年举办一次的占比为4.30%、从来没举办的占比为9.91%,统计数据也说明枫桥地区注重通过拓展快乐体验路径的方式来提升社区的非正式控制能力。

(三)通过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来增强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集体记忆是社区认同的基本依据,是凝聚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思想渊源。拥有集体记忆的社区不能确定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社区,而缺乏集体记忆的社区必定是一个分裂、原子化的社区。对于一个社区而言,集体记忆意味着社区居民之间基于“我们”的想象共同体而形成一系列情感信念。

枫桥镇在治理实践中注重提升社区的居民对社区的参与来重塑集体的记忆。虽然在我国农村基层社会还是信息全对称的半熟人社会,但是传统时期的内生秩序已经逐步瓦解,枫桥也不例外。为此枫桥镇注重为居民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创造情感表达的机会,来重塑集体的记忆,并且还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使居民感受到、体悟到。这样在治理过程中使居民逐步产生了自身价值感,这种价值感会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同时这种情感表达中的每个节点不但会关涉到自己,而且会与他人产生关联,便于形成集体共识。现在枫桥镇的集体记忆重塑路径不仅仅在于增强个体之间的联系,形成对社区的归属和认同,还注重在社会居民独立性增强下的个体的精神愉悦和情感的满足。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基层的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更多的代议者和职业化的管理者,社区治理系统的良

性运行就是要处理好社区公民、代议者和职业行政管理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在枫桥镇的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居民以及居民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情感充分发挥着各主体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一旦个体理想中的个体参与集体的路径与现实中间个体参与集体的路径高度契合的情况下,个体的自我一致性和对公共事务的认同也会显著提高,促使个体与集体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现在枫桥镇主要通过四种具体路径来增强集体记忆,这些路径都是嵌入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一是开展日常生活叙事,枫桥的社会集体记忆不仅仅保留在文字、图像等有型载体之中,也存留在百姓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中。枫桥镇通过组织平台让群众有机会对之前的、社会关系、邻里交往展开叙事,这样使群众在内心中探寻到了集体的记忆资源。枫桥群众依托日常叙事的资源,掌握了向外表达内心情感、诉说心里事的“话语权力”,从而使枫桥居民主导了村庄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进程。二是仪式操演,枫桥镇在社区日常生活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社会的农村风俗仪式,并且沿用原有的操演办法。虽然现在枫桥镇发展迅速,各种餐饮娱乐场所一应俱全,但是每当有红白喜事的时候,枫桥镇居民还是习惯于在村子里举办宴席来宴请大家的风俗习惯。各村两委建有礼堂,供社区居民组织各种仪式使用。枫桥镇这种仪式操演方式已经深深扎根于居民的日常记忆之中,并成为一种具有深厚情感表征的变量,影响着社区内每一个个体的日常行为。三是通过空间再造来重塑集体记忆,作为物理场所的空间存在,又是一种抽象的存在,是一套意义与符号的系统再现。枫桥镇乡村通过对记忆中的乡村空间内容进行再造,这些再造的空间是在村民记忆中已然内化的,通过这些原有村庄集体记忆再生产装置来追溯原有的村庄记忆。这种集体空间的物理再造产生的记忆渲染放置于枫桥居民个体的理性框架之中,便会对居民的日常行为产生影响。四是建构身份话语。枫桥镇因“枫桥经验”而闻名全国,枫桥居民也以身为枫桥居民而自豪,在枫桥镇基层治理中将“我是枫桥人”的话语深深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身份的话语既有来自国家权力的建构,但更多的是来自群众日常生活的体验,是内生于枫桥社会发展的实践。

(四)通过嵌入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增强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

社区安全需要关注情感、意识、认同和联结这几个关键要素。简言之,社区安全是人们对社区持

续认同,并联结在一起抵御风险的共同体安全。枫桥地区社区安全治理嵌入融合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于社区安全稳定具有促进作用,与日常生活割裂的社区治理则必然给社区安全带来威胁。在微观层面,枫桥镇的治安治理工作关注个体日常生活安全状态,具有识别差异性的安全风险能力,将社区认同作为社区安全的核心,通过良性有序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防范“稳定性”和“过程性”风险,进而维护“个体安全”与“集体安全”,保障枫桥社会处于有序状态。在枫桥镇开展基层治理过程中,将“个人对于公共体系的依赖”和“公共体系能够有效进入个人场域”为工作方法,使得国家、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治理方式、情感、意识嵌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当然,社区面临的安全风险和冲突问题复杂多元、千变万化,枫桥镇在联结领域中不断探索将国家、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的基层治理工作嵌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形成多元路径,从一项项先进经验或本土实践里挖掘和构建一系列有效的“联结机制”。

笔者在数据分析中发现,枫桥镇注重通过将思

想教育和法律教育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方式来增强社区的非正式控制能力。在数据统计中认为自己所居住社区过去一年开展很多次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居民占比为44.5%、过去一年开展几次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居民占比为37.84%、过去一年开展一次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居民占比为5.81%、过去一年没有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居民占比为11.31%。

五、结语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依托于高社会资本存量的枫桥非正式社会控制在枫桥社会治安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含着我国基层社会治安治理的历时性发展经验,这些经验不但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与我国的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方略密不可分。再次需要强调的是,枫桥地区非正式社会控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社区安全治理方式,在开展社区非正式社会控制过程中要根据社区不同的形成类型、结构特征和资源优势构建具有差异化的非正式社区控制方式。

参考文献:

- [1] CLARKE R V, CORNISH D B. Modeling offender's decisions: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policy[M].//M. Tonry, Morris N Eds. Crime and justice: An annual review of research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23-42.
- [2] BRANTINGHAM P J, BRANTINGHAM P L. Introduction to the 1991 reissue: Notes on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M].//BRANTINGHAM P J, BRANTINGHAM P L Eds,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Environmental criminology, 1991: 1-6.
- [3] HIPPI J R. Block, tract, and levels of aggregation: Neighborhood structure and crime and disorder as a case in point[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659-680.
- [4]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5] 陈柏峰. 乡村江湖中的“混混”群体[J]. 文化纵横, 2015(1): 43-48.
- [6] 詹姆斯·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M]. 王晓毅,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7] 陈柏峰. 熟人社会: 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J]. 社会, 2011, 31(1): 223-241.
- [8] 陈涌清. 中国古代基层乡村治安主体的演变[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5(1): 73-82.
- [9] 陈蕴茜. 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J]. 史林, 2006(1): 1-18.